

接納或脫離一個族群，因此造成族群邊界變遷（認同變遷）。兩個互動密切的族群，經常互相「關懷」甚至干涉對方的族源記憶。接受強勢族群給予的族源記憶，經常發生在許多少數族群之中。在一個族群內部也經常形成許多次群體，互相爭論到底誰對本族群的「過去」有詮釋權。

以上的研究在考古學上強調生態考古的重要，在歷史學上將文獻史料作為古人的歷史記憶。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對「異例」（anomalies）——矛盾的文獻記載、變遷的考古現象，以及文獻與考古資料間的差異——的分析與詮釋；相信如此能給我們更多的知識，並避免類比法中對於同異的主觀偏見。這樣的歷史研究其最終目的已不是釐清過去所發生的片斷史實，而是探索人類的社會本質——人類如何以「過去」來凝聚、修正其社會結群——及其在人類歷史上的發展。

王明珂

學經歷：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學士(1979)、碩士(1983)

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(1992)

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(1993-迄今)

國立師範大學兼任副教授(1993-96)、國立政治大學兼任副教授(1994-96)、東吳大學兼任副教授(1997-迄今)

## 明代經學研究的問題

楊晉龍

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助理

明代學術空疏是明亡（一六四四）後多數學者的共識，經學積衰而只承襲宋元人成說毫無特色，更是顧炎武（一六一三～一六八二）以來學者們認定的事實，而顧氏更在《日知錄》中宣稱「明代經學之廢」，從明成祖（朱棣，一三六〇～一四二四）命胡廣（一三七〇～一四一八）等人在永樂十二、十三年（一四一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到一四一五年十月七日）編《五經大全》開始，因為這些書全是剽竊抄襲元人的書來欺瞞讀書人的作品，從此以後，所有論到《五經大全》的文章，都以《日知錄》的說法為定論，以為《五經大全》毫無價值。

〈論《詩傳大全》與《詩傳通釋》的差異〉和〈《詩傳大全》來源問題探究〉二文，主要以《詩傳大全》為例，針對這個學界已流行三百多年的《五經大全》「全襲」元人作品的通說，重新加以檢討。根據《日知錄·四書五經大全》一文考證所得，《詩傳大全》「全襲」元代劉瑾的《詩傳通釋》，筆者以顧氏之說為基礎，以實證的統計方式加以檢證分析，把《詩傳大全》「博引諸家之說」（〈凡例〉言）包括：注音（直音和反切）、解釋字詞和名物制度、說明詩旨等近六千條的條文，用來和《詩傳通釋》引錄的條文，逐條加以比對。結果發現兩書條文相同者甚多，但《詩傳大全》的條文，相對於《詩傳通釋》引錄的條文，包括增添、刪除、改字、移位等情形共有一一三五處不同，佔《詩傳大全》引錄條文五

九五二條的百分之十九以上，可證《日知錄》「《詩經大全》則全襲元人劉瑾《詩傳通釋》，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成劉氏曰」的說法，並不完全正確。

顧炎武《詩傳大全》全襲《詩傳通釋》的說法，影響後代甚大，但這一說法並非顧氏的創見，明代李默（一四九九～一五五六）早在《續孤樹哀談》中已提及。《詩傳大全》來源除顧氏說法外，另有明代顧夢麟（一五八五～一六五三）和清代陳啓源（？～一六八九）在所著《詩經說約》和《毛詩稽古編》中，認為《詩傳大全》是抄襲元人朱公遷的《詩傳疏義》而成，這二種不同的說法，卻同時出現在紀昀（一七二四～一八〇五）等編著的《四庫全書總目》中，此外在朱彝尊（一六二九～一七〇九）的《經義考》中，又引錄有陸元輔（一六一七～一六九一）認為《詩傳大全》對宋代謝枋得（一二二六～一二八九）《詩傳注釋》「所採頗多」，以及陶成（．．．一七二三．．．）在雍正八年（一七三〇）修成的《江西通志》中，認為《詩傳大全》「多采」元人曹居貞《詩義發揮》等二種說法，再則錢大昕（一七二八～一八〇四）則認為《詩傳大全》的「體例」源自胡一桂（一二四七～？）的《詩集傳附錄纂疏》。為瞭解這些說法的是非，筆者於是參考相關著作數十種，加以檢證分析，主要是把《詩傳大全》中近六千條條文的來源，逐條溯源，考察其出處及流傳情形，結果發現前述諸家說法有是有非，而絕不能說已把《詩傳大全》的來源問題說清楚，不客氣地說：他們的說法是「似是而非」。實際的情形是：《詩傳大全》確以《詩傳通釋》為底本，而非完全抄襲，因為在《詩傳大全》五九五二條的條文中，有五二四條（包括文字稍

有參差，但意思相同者）和《詩傳通釋》相同或近似，所佔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六弱；另外百分之十四強則採自元代羅復的《詩經集傳音釋》、曹居貞《詩義發揮》、朱善《詩經解頤》及明人修纂的《皇朝郡邑志》，以及猶未考出來源的少數條文，筆者疑其來自胡一桂的《詩集傳附錄纂疏》等二本以上的書，再則「體例」實源自呂祖謙（一一三七～一一八一）的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。這是經過詳細比對後，有關《詩傳大全》來源的較確實的結論。

確定《詩傳大全》的來源後，再分析顧炎武「輕下」論斷的緣故，大約有三點：一則顧氏在當時可能只是「匆匆過目」（借用本所研究員林慶彰先生的說法）之下而言其大體，並未詳細比勘，故說得稍微「過火」；再則顧氏是以表現個人學養的著作標準，來要求胡廣等綜合各家諸說的編輯工作，不免標準訂得太高，事實上胡廣等人編《五經大全》，就和國立編譯館編高中《國文》、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》等情況一樣，只是教學或考試的標準本，並不足以代表一時代的學術成就；三則顧氏特別重視「氣節」，觀《日知錄》中〈宋世風俗〉、〈名教〉、〈廉恥〉等篇可知，而胡廣則是建文帝（朱允炆，一三七七～？）所取進士（建文二年狀元，建文帝改其名曰胡靖），卻投降永樂帝，正是顧炎武所不恥的「貳臣」，由於對其人格懷疑，故禍延及其所編之書。不過最主要的關鍵還在於顧氏以「明朝遺民」自居，追究明代滅亡的主因，以為經學不振是其「禍首」，而胡廣等編《五經大全》是始作俑者，故歸罪特深，可知顧氏主要是從「政治責任」的角度來評價，絕不是單純的「學術評價」，因此不免有些「過言」，後代

---

學者卻襲而不察，歷三百年而不省，令人訝異，故筆者纔強調為學要有張以仁老師「尊重權威而不盲信權威」的態度，與學者共勉。再從比較實際的角度來看：胡廣等在不到一年（二九〇日）的時間內，編成二部十本（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禮記》《春秋》、《四書》、《性理大全》）共二百二十九卷的「大書」，以成書為底本，實無可厚非，雖缺乏嚴謹的學術價值，卻也不能抹煞其「整比」的工夫，故不該以顧炎武等的「過言」為定論。

上述兩文的貢獻：消極上是「破」除學者長期以來，受到顧炎武等「不正確」論斷所導致，而對明代《詩傳大全》評價的「誤解」，將幾百年來的「通俗觀點」加以澄清，訂正俗說的訛誤。積極上是考證出《詩傳大全》的實

際來源，元元本本，還其原始；並分析顧炎武致誤的緣由，還其歷史真相；又將胡廣等編書的功過，給予客觀的評價，對爾後明代經學研究具有澄清及引導的積極作用。

---

---

楊晉龍

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

學士(1984)

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

究所碩士(1989)

現就讀於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台灣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(1989-迄今)

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助理(1993-迄今)

---

---